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必由之路？*

——中国式产能过剩的经济学解释

周 密 刘秉镰

内容提要：本文跳出市场和政府之争，在传统供需平衡模型中引入退出价格和饱和需求等新假设，通过消费结构和住房属性的异质性处理、二元市场的均衡分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主要观点是：中国式产能过剩是商品和住房二元市场叠加的饱和和需求式过剩。普通商品市场的“饱和和需求陷阱”和住房市场的“投资偏好陷阱”是关键制约点。这使得需求刺激政策在饱和和需求式过剩中失灵，并通过二元市场的“劣驱良”效应，引发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应通过二元市场的联动式调控，形成以供给方向和供给对象的结构调整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关键词：中国式产能过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退出价格 饱和需求

一、引言

近三年来，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从“三期叠加”到“经济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①中国式产能过剩及其引发的“三难”选择困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实践背景和主要动因。

与西方发达国家以金融冲击和失业增加为特征的危机不同，中国式产能过剩集中表现为14个工业品行业^②的产能利用率偏低，以粗钢、水泥、平板玻璃最为严重。这三大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4.9%、75.7%、73.5%（纪志宏，2015），接近或低于75%的产能严重过剩的衡量值。针对上述状况，解决中国式产能过剩面临“三难”选择困境。“一难”，继续采用总需求刺激政策的效果渐不明显。“二难”，若不进行总需求刺激，大量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僵尸型企业，^③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风险。“三难”，若突出强调“看不见的手”，私人生产的盲目性与社会公平问题也会日益突出。

在中国式产能过剩及其引发的“三难”选择困境面前，部分学者将问题归咎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有效和长期无效，并直指宏观意义上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体制性、制度性产能过剩。然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上述观点难以完全解释：1992—2012年的20年间，中国的宏观调控主要以需求侧政策为基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选题研究中心，2016），当时效果长期显著，而现在就不显著了呢；虽然当前许多国有企业存在产能过剩，但为什么诸多民营企业同样存在过剩呢？^④如果简单地把当前的产能过剩归咎为制度性过剩，那么究竟应该从何种制度入手解决问题？当前关于市场与政府的一般性争论，正是囿于西方经济学思路所出现的在“凯恩斯主义”和“斯密主义”间摇摆的现象。由于缺乏切合中国实际国情且符合长期增长目标的系统性理论分析，中国式产能过剩的讨论正在陷入一场似是而非的“市场和政

* 周密、刘秉镰，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nkzhoumi@126.com，liubl@nankai.edu.cn。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JL10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资助。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及沙恩水硕士、刘洋博士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 《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人民日报》2016年1月4日。

② 2015年12月，工信部认定的落后及过剩产能的行业包括：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水泥、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铅蓄电池等14个行业。参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相关工作的通知》，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4562358/content.html。

③ 《中央政府拿出1000亿元用于去产能职工安置》，新华社北京2016年2月25日电（记者赵晓辉、许晟），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25/c_1118158486.htm。

④ 我国诸多房地产企业是民营企业，也存在大量待销售房产。参见《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mt.sohu.com/20160826/n466244093.shtml。

府之争”。

前期观察显示，上述 14 个工业品行业的过剩产能集中于两大领域：一类是煤炭等与普通商品市场密切相关的上游基础原材料产品；^①另一类则是炼钢、炼铁、水泥、电解铝等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上下游产品。从 2010 年 4 月开始，国务院连续推出房地产调控政策，房地产投资增速由 2010 年初的近 40% 降到 2015 年底的 1%，钢铁、化工、水泥等领域出现严重产能过剩，房地产待售面积、空置面积和过剩面积激增。^② 本文将根据中国最新实践，立足于普通商品和住房特殊商品的二元市场，在传统供需平衡模型中引入退出价格和饱和需求等新假设，采用包含凯恩斯国民收入和斯拉法工资-利润思想的曲线表达（李海明，2014），对中国式产能过剩的表现、成因与本质进行分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解释。

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研究综述；第三部分是理论基础；第四部分是普通商品市场的均衡分析；第五部分是住房特殊商品的均衡分析；第六部分论述中国式产能过剩解决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第七部分为结论。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综述

1. 西方结构性改革的研究框架

西方的结构性改革泛指针对经济衰退或冲击等危机局面，以提高潜在经济增长为目标，以放松主要领域管制为方式的重大政策调整，具有典型的危机引致型特征（John, 1994）。当遭遇经济衰退或重大危机时，西方政策制定者将采取结构性改革^③而不是短期应急方案（Agnello et al., 2015b）。结构性改革的响应方向具有一定的规律：当经济增长或收入下降时，通常采用贸易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Aghion and Blanchard, 1994; Kevin et al., 2016）以及制度改革（Efendic et al., 2011）；当出现通胀和周期波动时，采用金融、财政和税收改革（Agnello et al., 2015a; Helbling et al., 2004; Boeri et al., 2006）等。针对不同的改革类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建了结构性改革指数作为基本测度方法。这个指数从金融、贸易、外汇账户、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自由化程度进行评估。后期进一步增加了法律和秩序，腐败和官僚制度等软性制度质量的测评（Antonio and Che, 2012）。我国学者关注最多的是美国总统里根采用的供给学派结构性改革方案。该方案涉及大幅度减税计划，结束对部分行业的竞争管制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本质上也属于以自由化和放松管制为主的西方结构性改革框架。很多学者从字面角度进行解读和联系，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同于西方经济学中供给学派或其延伸^④，引起了诸多误读。

2.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现状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出现中国式产能过剩后的政策转向，同样具有危机引致型特征，然而其阶段背景、政策内涵与调控手段等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2015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重点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从形势的判断、问题的诊断、

① 以煤炭行业为例，截至 2015 年 12 月初，煤炭的生产价格指数已连续 40 个月呈负增长状态，亏损面已高达 80% 左右。参见《中央出重拳！八大行业“僵尸”国企逐步退出》，光明网，2015 年 12 月 28 日，http://economy.gmw.cn/2015-12/28/content_18269718.htm。

② 2015 年 12 月，商品房待售面积 6.6 亿平方米，在建施工面积达到 74 亿平方米（国家统计局，2016）。按照历史最高峰 2013 年的销售面积（13 亿平方米）进行估计，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全部销售出去，去库存压力巨大。空置率远超 20%，已高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2015 年全年商品住房过剩约 21 亿平方米，其中现房过剩 1 亿平方米（库存去化超过 18 个月），期房过剩 19.96 亿平方米（库存去化超过 2 年），总库存约 39.96 亿平方米（倪鹏飞和丁如曦，2016）。

③ 结构性改革是面对危机后促进潜在经济增长重大举措的总称。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需要结构性改革，因此，不能简单的用市场和政府来区分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而应该强调特定危机下，针对性问题导向、顶层设计和解决方案的具体分析。

④ 2016 年 1 月 26 日，斯蒂格利茨在《中国艰难的新常态》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可以看作是在世界另一边上演的西方凯恩斯学派、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之间的学术争论。

工作的思路，到重点任务、改革举措、重大原则，提出了逻辑严谨、系统完整、方向明确、操作性强的一揽子方案（杨伟民，2016）。此后，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原则，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和热烈的讨论，集中于如下两大问题。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是什么

主流观点有两种：第一种基于供需对应关系的解释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角度：①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传统总需求刺激政策的差异。供给侧是从供给端实现微观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持续的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以往的需求侧，强调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更多的是平衡经济（黄益平，2016）。②强调政策改革期限的长短。需求侧的管理是短期政策，而供给侧是长期政策（胡鞍钢等，2016）。第二种是基于结构主义的解释框架，强调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是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李佐军，2016a）。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怎么改

相区别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主张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或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来解决（吴敬琏，2016）；第二种以凯恩斯总需求管理为框架，建议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张进一步优化投资，特别是增加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林毅夫，2016）^①；第三种立足于结构，强调对人口、产业、消费、区域、要素投入、增长动力、收入分配等多元结构的全面调整（贾康，苏京春，2015）。随着讨论的深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趋向于细致化，并越来越开始指向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解放生产力、改善政府和市场关系为主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上来（李扬，2016），形成了以体制、机制改革等为中心的全局层面和分重点领域各个突破的局部层面。全局层面上，重在推进科教人才管理、金融、信息化、财税、企业制度和价格等体制改革（李佐军，2016b；刘霞辉，2013）以及优化竞争机制和构建新型激励机制等机制改革（吴敬琏，2016；迟福林，2016）。局部层面上，重在推进人口改革（蔡昉，2016）；创新发展（李兰，2016）；土地流转制度、生产服务性要素供给等要素市场领域改革（贾康，201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从实践层面总结的战略方案，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新视野、新角度和新方法，但由于这一新理念提出的时间较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研究尚未达成理论共识。总体思路仍然局限在如何提高供给效率的层面，且存在着明显的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向一切领域的结构泛化特征。如果不从历史发展和本土实践出发，科学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为什么的经济学原理，就无法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重大理论问题，必然出现就事论事或落实不力的困境。这对激活本土学术自觉，提出了迫切需求和重大挑战。

三、适应中国国情的需求函数新拓展：理论基础

本部分在传统需求函数中引入退出价格和饱和需求两个新假设，适应中国国情对传统需求函数进行新拓展，构建系统阐释中国式产能过剩成因的理论基础。

1. 新假设的引入：饱和需求和退出价格

还原经济增长过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随着微观主体收入的提高，我国市场的阶段性特征从生产主导开始向消费主导转型，考虑消费者对商品消费存在两个上界。

第一，需求数量的上界。当对此物品的占有量超过界限规定限度时，消费者便不再增加对该种物品的消费需求。这个需求界限就是消费者对该物品的饱和需求量（祁晓冬，1996）。当消费者占有商品的数量超过饱和需求量后，其边际效用递减为零。据此，构造一个效用函

^① “观察者网”于2016年6月8日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采访了一批知名学者，包括张军、余永定、朱天、林毅夫、姚洋等九位学者，采访录音整理达八万余字，在这次采访中林毅夫提出了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观点。

数的参数：饱和需求量 φ 。用饱和需求量的概念可以勾画需求的结构性特征。达到饱和需求量之前，消费者是否购买该商品主要受收入、价格等因素影响；达到饱和需求量之后，消费者不再增加购买，后续是否增加购买主要受偏好影响，不受收入、价格等影响。

第二，需求价格的上界。考虑一种价格为退出价格 p_t 。退出价格是消费者在特定预算约束下能支付的最高价格，反映消费者的现实购买力。当商品的价格超过退出价格时，消费者对该商品的购买量为零。从需求角度来看，由于需求受到预算线的约束，当超过预算约束之后，需求将选择被动退出，于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就是退出价格。

2.饱和需求和退出价格内生下的需求函数新拓展

(1) 需求函数的新拓展

假定消费者的效用满足三个基本假定：效用非负且有限；需求非负且有限；边际效用递减。消费者拥有某种商品的数量为 q ，令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函数为： $mu=h(q)$ ，当 $0 \leq q \leq \varphi$ 时，有 $h(\varphi)=0$ 成立。设 Φ 表示商品数量为零时，消费者对单位商品的效用评价，称为零点边际效用（祁晓冬，1996）。根据上述假定，有 $h(0)=\Phi$ 。据此，可以得到上述效用函数满足的三个条件：

$$\left\{ \begin{array}{l} h(0) = \Phi \\ q = 0 \\ \frac{d(mu)}{dq} = h'(q) < 0 \end{array} \right.$$

假定效用函数基本形式为 $u = \Phi[1 - \frac{q}{\varphi}]$ ，商品 i 的效用表达式为：

$$u_i = \int_0^{q_i} \Phi[1 - \frac{q}{\varphi_i}]dq = \Phi q_i(1 - \frac{q_i}{2\varphi_i}), \quad \text{则对于 } n \text{ 种商品的总效用函数有:}$$

$$U = \sum_{i=1}^n \Phi q_i(1 - \frac{q_i}{2\varphi_i})$$

假定市场出清价格为 p_i ，消费者的预算收入为 m ，对总效用函数求极大值为：

$$\text{Max } U = \sum_{i=1}^n \Phi q_i(1 - \frac{q_i}{2\varphi_i})$$

$$\text{s.t. } \sum_{i=1}^n q_i p_i \leq m; \quad 0 \leq q_i \leq \varphi_i$$

(2) 需求函数新拓展与三种消费选择

假定市场上共有 n 种商品^①，退出市场的商品有 γ 种， $1 \leq \gamma \leq n$ 。 γ 种商品的需求恒为零。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中国发展实践， γ 种商品的退出有两种情况：一是，饱和需求量为零时的极端饱和情况，如无线寻呼机等这类消费结构升级后，因不再符合消费要求而退出的产品情况；另一种是市场价格高于退出价格已经退出的情况。为分析精炼，此处不讨论已经退出市

^① 由于中国式产能过剩主要表现为产品积压，过剩的产量才是本文重点研究的对象，因此，后文将重点讨论落在横轴上的产量。

场的 γ 种商品，而是重点分析保留在市场上的 $n-\gamma$ 种商品。此时，根据 $n-\gamma$ 种商品，利用亨德森和匡特（1988）提出的库恩-塔克条件（Kuhn-Tucker condition），计算 $n-\gamma$ 种商品的退出价格 p_{ti} 为：

$$p_{ti} = \Phi \left[\frac{\sum_{k=1}^{n-\gamma} \frac{\varphi_k}{\Phi_k} p_k^2 - \frac{\varphi_i}{\Phi_i} p_i^2}{\sum_{k=1}^{n-\gamma} \varphi_k p_k - \varphi_i p_i - m} \right], \quad i=1, 2, \dots, n-\gamma \quad (1)$$

求解 $n-\gamma$ 种商品的微观需求函数，可以得到以下三种基本情况。

第一种情况，这些商品高于市场退出价格，消费者迫于预算约束无法购买，购买量为零。

$$q_i = 0, \quad p_i \geq p_{ti}, \quad i=1, 2, \dots, n-\gamma \quad (2)$$

第二种情况，这些商品低于市场退出价格且低于饱和需求量时，消费者的预算内需求 q_i ($i=1, 2, \dots, n-\gamma$) 为：

$$q_i = \varphi_i \left[1 - \frac{p_i}{\Phi} \left(\frac{\sum_{k=1}^{n-\gamma} \varphi_k p_k - m}{\sum_{k=1}^{n-\gamma} \frac{\varphi_k}{\Phi} p_k^2} \right) \right] = \varphi_i \left[1 - \frac{p_i}{\Phi} (I) \right], \quad \sum_{k=1}^{n-\gamma} \varphi_k p_k \leq m, \varphi_i > 0 \quad (3)$$

为简化问题，不妨设 $I = \frac{\sum_{k=1}^{n-\gamma} \varphi_k p_k - m}{\sum_{k=1}^{n-\gamma} \frac{\varphi_k}{\Phi} p_k^2}$ 。

第三种情况，这些商品低于市场退出价格且高于饱和需求量时，消费者以饱和需求量为界限购买相应的商品。这意味着虽然消费者手中仍留有预算，但是消费者以饱和需求量为界进行消费，剩余的预算持币待购、用作储蓄或投资等用途。

$$q_i = \varphi_i, \quad \varphi_i p_i < m, \quad i=1, 2, \dots, n-\gamma \quad (4)$$

3. 饱和需求和退出价格内生下的需求曲线及其经济学涵义

为使问题精简便于理解，不妨考虑一类商品的情况，即当商品 $i=1$ 时，对一类消费商品产量进行计算有：

$$\left\{ \begin{array}{l} 0, \quad p > p_t \\ \frac{m}{p}, \quad \varphi p > m \\ \varphi, \quad \varphi p < m \end{array} \right. \quad (5)$$

根据上述三种情况，可以画出一类商品时的个人需求曲线如下图1（左）所示，其经济学涵义如下。

（1）退出价格约束下的情况

一旦商品的价格高于退出价格，消费者将被动选择不购买商品。这反映了传统西方经济学提出的，消费的欲望受收入预算的硬性约束无法形成真实需求的情况。

(2) 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情况

当商品饱和需求量和价格的乘积大于预算收入，即没有达到饱和需求时，消费者按照商品价格消费相应的商品数量。

(3) 饱和需求约束下的情况

当饱和需求量和价格的乘积小于预算收入时，消费者按照饱和需求量进行消费。超过饱和需求量的部分，消费者即使具有购买力，也主动选择不购买。在这种情况下，饱和需求量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约束条件。

如图 1 所示，根据个人需求曲线汇总成市场需求曲线，差异在于：个人需求曲线中，高于退出价格的部分，需求量为零，因此， p_t 以上的需求曲线与纵轴重合，如图 1（左）。这是个人需求全部退出的极端情况。而市场需求曲线中，退出价格以上的部分与纵轴趋近，但不重合，如图 1（右）。现实市场中并不存在连一个消费者都没有的全部退出极端情况，因此，市场需求曲线分两段：正常价格发挥作用的区间和饱和需求量为界的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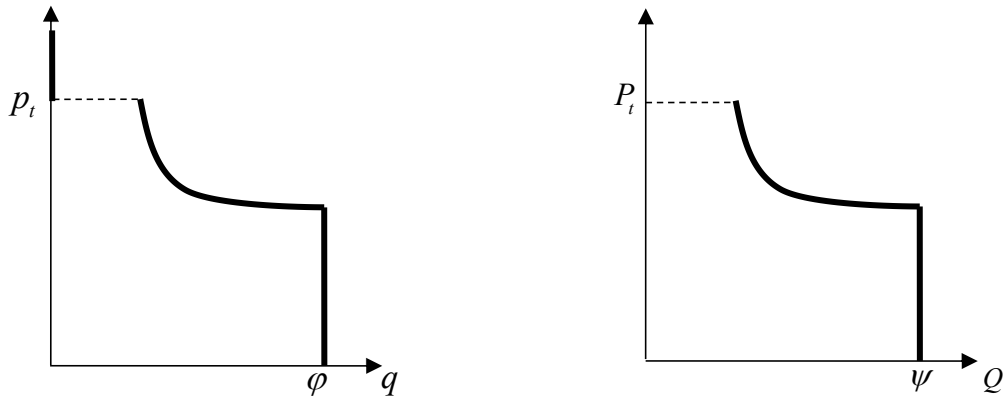


图 1 个人需求曲线（左）和市场需求曲线（右）

适应中国国情的需求函数与西方经济学传统需求函数的最大差异在于两方面：一方面，传统西方经济学是工业经济背景下的供给导向型需求；而本需求函数更强调后工业时代消费主导型需求。传统西方经济学将饱和需求作为特殊情况来处理，重点考虑的是消费者退出价格约束下效用的最大化，这仍然是消费者的被动选择。而本需求函数将饱和需求作为需求函数的内在应有之义。当达到饱和需求时，消费者将有主动选择权。另一方面，传统西方经济学对饱和需求的理解侧重个人需求层面；而本需求函数更强调市场需求层面的饱和意义和阶段意义。凸显饱和需求不是微观层面的边际消费递减为零，而是微观行为累积后的市场特征。这正是中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要义。

四、中国式产能过剩的成因之一：普通商品^①市场的均衡分析

退出价格是从需求侧角度对西方经济学中均衡价格的新理解，然而饱和需求却是中国遇到的新阶段与新变化。本部分将纳入两大假设的供需平衡模型应用到普通商品市场中进行分析，并采用凯恩斯主义曲线进行原理表达。

1. 普通商品市场中退出价格式过剩和饱和需求式过剩

(1) 普通商品市场的退出价格式过剩

如图 2（左）中所示，S 曲线与 D 曲线相交于 F，相应的市场均衡价格为 P_1 ，均衡产量

^① 本文所指的普通商品是指仅具有消费属性的商品。后文将对既具有消费属性又具有投资属性的特殊商品进行对应分析。

为 Q_1 。虽然理论上存在这一供需均衡点，然而从历史统计来看，供给过剩却是一种常态。假定，在供给曲线上存在任意一点 E ，对应的产量为 Q_2 。此时，相对于市场均衡产量 Q_1 而言， Q_1Q_2 部分是退出价格式过剩。为什么呢？当市场产量为 Q_2 时，均衡价格 P_1 即为退出价格 P_1 ， P_1-P_2 为高于退出价格的区间，因此，所对应的产量 Q_1Q_2 就是供给价格 P_2 高于退出价格 P_1 后出现的过剩，即退出价格式过剩。美国早期大萧条中将牛奶倒入大海^①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后由于内需不足导致的过剩都是供给价格高于预算约束下的退出价格所导致的退出价格式过剩。由公式（3）可知，退出价格主要与预算收入、商品价格相关。这一阶段，有两种方案可以提高退出价格的容纳水平，从而减少退出价格式过剩。第一种方案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刺激总需求，提高预算收入。这将推动需求曲线外移至 D' ，提升购买力，使市场供给过多的产品被更强的购买力消化，市场出清的商品数量扩充到 Q_2 ，原有 Q_1Q_2 的过剩得以消化。第二种方案通过斯密自由主义的效率提升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从而间接提高收入进行缓解。供给曲线右移到 S' ，市场能够消化的商品数量扩充到 Q_2 ，原有 Q_1Q_2 的过剩得以消化。面对退出价格式过剩，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或斯密主义的效率提升都能降低退出价格对于产量出清的约束，从而消化退出价格式过剩，因此，美国早期大萧条和中国早期的内需不足中采用凯恩斯主义均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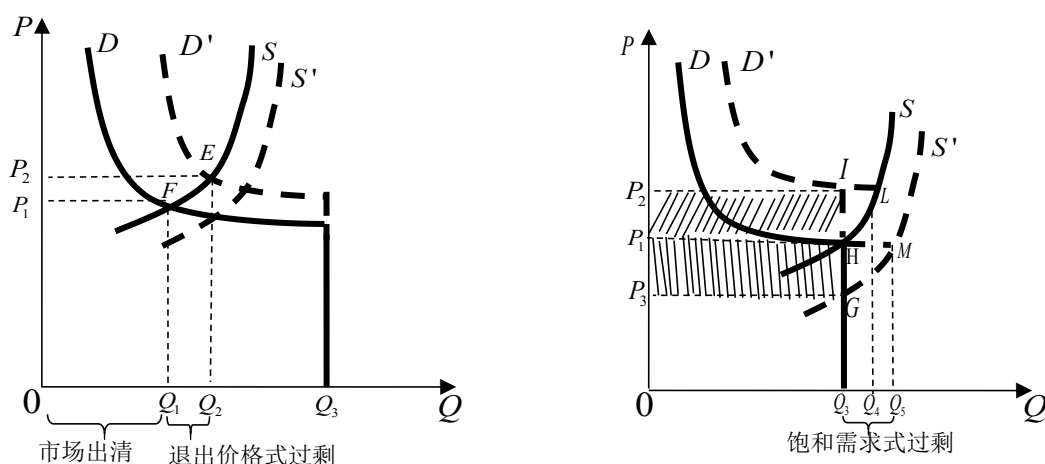


图2 普通商品市场的退出价格式过剩（左）和饱和需求式过剩（右）图示

（2）普通商品市场的饱和需求式过剩

如图2（右）所示，当需求侧存在一个消费需求结构的转折点 Q_3 。在 Q_3 之后，市场消费需求普遍达到饱和需求量，呈现“饱和需求陷阱”。陷阱一词在经济学中表示一种高度均衡状态，任何扰动性的改变都不能持续，最终仍然回到原来的均衡上面（蔡昉，2013）。该陷阱是指：由于市场上已有的商品达到大多数消费者的饱和需求量，即使消费者不受预算的约束，消费者也主动选择不增加购买，于是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趋近零。 Q_3 以后的产量即为达到饱和需求之后，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呈现的饱和需求式过剩。

如果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需求曲线从 D 外移到 D' 。由于面临“饱和需求陷阱”，需求量对收入的弹性为零，增量消费仍为零， P_1P_2IH 的阴影面积就是资金转向持币待购或转作投资的部分，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替代性大大减弱。如果采用斯密自由主义的效率提升方式来降低价格，供给曲线从 S 降低至 S' 。由于面临“饱和需求陷阱”，需求量对价格的弹性也为零， P_3P_1HG 的阴影面积即为转向持币待购或转作投资的部分。

假定，此时无视普通商品市场的“饱和需求陷阱”，而继续按照凯恩斯主义或斯密自由主义方案增加产量，那么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方案下，不受饱和需求限制的理想需求 D'

^① 将牛奶倒入大海是厂商为了维持较高市场价格，保持垄断优势，但是能够维持较高价格的背后是因为市场整体以供给为主导。此时的过剩是由于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购买力不足而形成的退出价格式过剩。正因如此，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完美诠释了这种不对称的市场结构。

曲线延长，并与供给 S 曲线相交于 L 点，对应的产量为 Q₄；在斯密自由主义的效率提升方案下，不受饱和需求限制的理想需求 D 曲线延长，与供给 S' 曲线相交于 M，对应的产量为 Q₅。此时，Q₃ 之后的 Q₃Q₄ 和 Q₃Q₅ 就是无视“饱和需求陷阱”带来的饱和需求式过剩。

2.商品消费结构的异质性与饱和需求式过剩的关系

(1) 商品消费结构的异质性

饱和需求式过剩的出现与普通商品市场消费结构的异质性密切相关。在时间上，消费需求结构呈现阶段演进的异质性。一方面，当低层次的消费需求满足之后，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将成为主要诉求（马斯洛，2013）；另一方面，必需品和高端商品所对应的产品品类随时间的演进呈现变化性。在收入处于较低层次时，大量制造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 1（Hollis, 1960），属于高端商品；随着收入的提升，大量标准化制造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会大大下降，转为必需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已有的 γ 种商品已经达到饱和需求，需要挖掘或发现 $(n-\gamma)$ 种潜在需求或新需求。在空间上，消费需求结构呈现地域范围的异质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和全球贸易的推进，当一国商品无法满足国内需求时，持币待购的消费需求将跨越国际进行地域选择性消费，通过日益便利的国际采购拓展饱和需求的边界。

(2) 现阶段普通商品市场饱和需求的识别和判断

识别与判断市场是否存在饱和需求的重要指标是普通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①。本文结合《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中国城镇生活价格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等数据测算了 1998-2012 年，1999-2014 年我国主要基础原材料产品和标准化制造品市场饱和需求的程度。结果显示，我国主要基础原材料产品和标准化制造品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前 5 年达到高点后持续下降。截止 2014 年，洗衣机、电视、冰箱、布等需求收入弹性都在 0.2-0.5 之间，只有汽车的需求收入弹性还在 1 附近，但弹性也在下降趋势通道当中。水、电、煤炭等基础原材料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在 0 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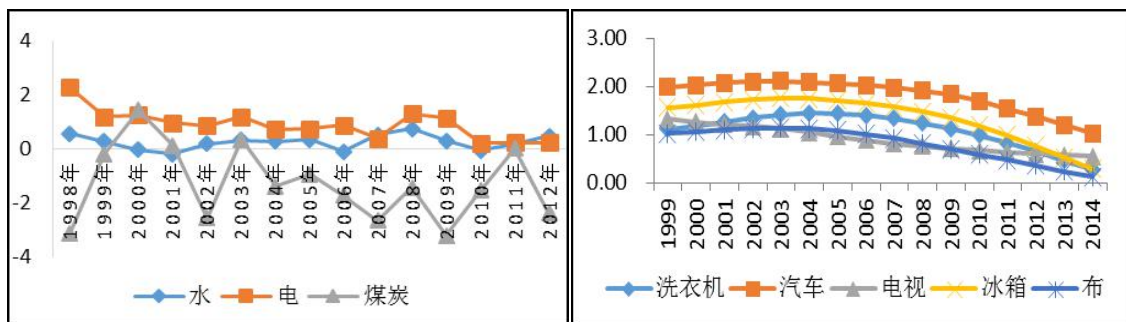


图 3 普通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

根据消费需求呈现地域范围的异质性，识别与判断是否存在饱和需求的重要指标是高端消费的地域性。当前中国一方面存在日益严重的工业品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海外消费和奢侈品消费等引领全球。2015 年全球奢侈品营业额中一半来自中国消费者。中国消费者的花费达 1168 亿美元，其中 910 美元以上的奢侈品消费发生在海外，占 78%（卫兴华，2016）。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购买的商品已从珠宝首饰、名包名表、名牌服饰、化妆品等奢侈品向电饭煲、马桶盖、奶粉、奶瓶等普通用品延伸。据测算，我国居民出境旅行支出超过 1 万亿元人民币（习近平，2016）。

上述证据可以初步判断，我国正处于 Q₃ 附近。在 Q₃ 之前，市场以必需商品的需求为主，退出价格式过剩是主要形式，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和斯密自由主义的效率提升方案可以缓解退出价格式过剩。而在 Q₃ 之后，市场以高端商品的需求为主，饱和需求式过剩成为

^① 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价格弹性最终也受收入约束，因此，本文选用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测算。基本公式为 $EM=(\Delta Q/Q)/(\Delta I/I)$ ，EM 为需求收入弹性，Q 为主要基础原材料品和标准化制造品需求量，I 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主要形式。市场并不是消费预算不足，也不是效率不高，而是市场需要适应新的消费结构，提供有效供给，亟需根据消费需求中时间演进结构和空间选择结构的异质性，探索和发现新需求(n-γ)是什么和在哪里，从供给侧解决“供给什么”的问题。

五、中国式产能过剩的成因之二：住房特殊商品市场的均衡分析

如果只是普通商品市场面临饱和需求，那么通过释放市场活力，市场终将寻找到新需求的方向，然而普通商品市场中，由于消费结构异质性带来的饱和需求却遭遇了住房市场中需求属性异质性带来的饱和需求，从而使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更加复杂。在2016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结构调整和改革任务中，房地产去库存化已经处于一揽子解决结构问题的关节点上，解释中国式产能过剩绝不能绕开住房市场^①。

1. 住房需求属性的异质性：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

在中国，与住房相关联的产业高达60个，住房已经成为影响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商品。近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为17.3%，房地产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支出法GDP的贡献率为53.4%（许宪春等，2015）。中国住房市场具有与西方显著不同的两个特征事实：一方面，西方的住房以消费属性为主^②，而中国的住房存在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杨赞等，2014），且在一定条件下双重属性可以转换。这增加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干扰性。投资需求存在过度预期和明显的羊群效应，因此住房的投资需求进入和退出迅速，如近年来各地炒房的温州团。同时，住房供给速度与住房投资需求的调整速度具有显著的不对称性，由此可能给市场带来极大的波动。另一方面，住房市场依据需求属性来确定饱和需求的程度。西方国家以税收调节为主，中国以凯恩斯主义政策为重要调控变量。当住房作为消费属性达到饱和时，一旦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实施，出于保值增值需求，饱和的消费属性开始转向投资属性，因此，与普通商品市场根据消费结构来确定饱和需求不同，住房市场应根据需求属性来确定饱和需求。为更好的考查住房市场的中国式过剩，下文将以凯恩斯主义政策为调控变量，考虑 T_1 、 T_2 和 T_3 三个发展阶段。

2. 住房需求的双重属性与住房市场的均衡分析

考虑 T_1 阶段，如图4（左）。无政策干预时，市场供给曲线 S 与需求曲线 D_1 形成均衡点 (P_1, Q_1) 。此时，部分人群达到住房消费的饱和需求，部分人群没有达到。

考虑 T_2 阶段，如图4（左）。当凯恩斯扩张政策开始实施时， D_1 曲线外移至 D_2 ， S 曲线外移至 S' 。如果不考虑住房需求的双重属性，市场均衡点应为 (P_2, Q_2) 。然而由于住房需求的双重属性，随着凯恩斯扩张政策的推进，一部分达到住房消费饱和需求的人群，出于保值增值的目的，开始转向住房投资需求^③，总需求增加，曲线 D_2 外移到曲线 D_3 。

OQ_4 是现实的住房消费需求。随着凯恩斯扩张政策的实施，如果不存在投资需求，则理论上市场的均衡数量为 OQ_2 ；但是由于存在投资需求，市场实际形成 OQ_3 的产量，对应的价格上涨为 P_3 。按照上涨后的价格 P_3 ，市场现实的住房消费需求减少为 Q_4 。于是， (P_2, Q_2) 是实施凯恩斯扩张政策之后，不考虑住房投资需求的理论均衡点； (P_3, Q_3) 是实施凯恩斯扩张政策之后，考虑住房投资需求的现实均衡点； (P_3, Q_4) 是实施凯恩斯扩张政策之后，考虑住房投资需求的情况下，住房消费需求的现实均衡点。

^① 房地产市场更侧重从产业和固定资产投资角度的理解，为保持本文论述和观点的统一，本文从消费需求角度统一为住房市场。

^② 由于设置了较高的税收条件，西方发展中住房的投资属性大大降低。

^③ 为简化问题，本文对住房投资和住房投机没有区分，而是将住房投资需求理解为住房消费需求达到饱和后的继续购买行为。这种简化的合理性在于，中国对住房的投资与西方靠租金收益折现的假设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以住房买卖获得投资收益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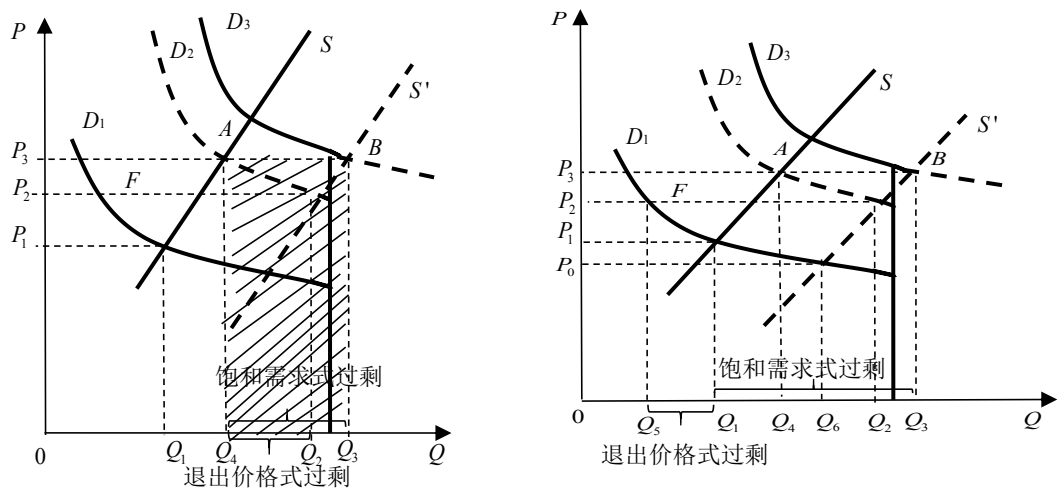


图4 T1、T2（左）和T3（右）阶段住房市场中的两种产能过剩

Q_4Q_2 是被住房投资需求挤出的住房消费需求，呈现退出价格式过剩。从 (P_1, Q_1) 到 (P_2, Q_2) 时，没有达到饱和和需求的人群可能通过收入的提升部分实现住房消费，但由于存在住房双重属性，投资需求迅速提升，抬高市场价格，使得上涨的房价 P_3 高于消费需求所能承受的退出价格 P_2 ，进而形成退出价格对消费的约束，呈现的退出价格式过剩。

Q_2Q_3 是存在住房投资需求下的虚假繁荣。凯恩斯扩张政策实施后，随着住房价格的上涨和预期上涨，市场不断增加投资需求，出现了住房的“投资偏好陷阱”。“投资偏好陷阱”是指，当住房是普通商品时，应受消费品饱和需求限制，然而凯恩斯的扩张政策使宏观上房价具有上涨的趋势和预期，住房作为投资品的诸多优良特性，使得住房市场“本应受，却不受”消费品饱和需求的限制，持续不断的扩大住房投资需求，使市场需求从 D_2 扩展至 D_3 ，且形成 D_3 后的虚线延长线。这部分投资需求不是住房消费支撑的需求，而是陷入“投资偏好陷阱”后呈现的市场虚假繁荣。

Q_4Q_3 在凯恩斯扩张政策实施时，是现实的住房投资需求；在凯恩斯收缩政策实施时，则是饱和需求式过剩。相对于住房消费而言， Q_4Q_3 部分本来属于饱和需求。一旦凯恩斯扩张政策减弱，由于住房投资需求进入和退出迅速的特征，不受饱和需求限制的投资需求将随之消失。此时，这部分作为饱和需求的性质开始起作用，带来饱和需求式过剩^①。由于住房消费属性和投资属性的相互转换，一旦凯恩斯政策扩张时，将陷入住房“投资偏好陷阱”，不受饱和需求的约束；而一旦凯恩斯政策收缩时，饱和需求的约束开始起作用，带来饱和需求式过剩。

考虑 T_3 阶段，如图4（右）所示。当凯恩斯收缩政策开始实施时，市场对房价上涨的预期下降，投资需求将随之减少， D_3 曲线左移到 D_2 曲线。由于投资需求的过度预期和羊群效应， D_2 曲线存在进一步向 D_1 曲线移动的趋势，具有成交量萎缩和价格降低的压力。如果按照斯密的自由主义方式，市场供给曲线 S' 和市场需求曲线 D_1 相交，市场按照 (P_0, Q_6) 进行出清，原有的饱和需求式过剩 Q_4Q_3 和退出价格式过剩 Q_4Q_2 将部分被消化。然而如果价格从 P_3 降至 P_0 ，且 $[(P_3 - P_0) / P_0] > 30\%$ ^②，一旦价格下降大于住房贷款的杠杆率，住房风险就完

① 由于此处退出价格式过剩 Q_4Q_2 和饱和需求式过剩 Q_4Q_3 在横轴上有重复部分，为更清晰的理解，举例说明。市场有两个家庭 A 和 B，正常出清的住房数量是 2 套住房。随着凯恩斯扩张政策的到来，其中 1 个家庭 A 又购买了 4 套住房，于是市场由 2 套住房增加到 6 套住房，增加的 4 套住房属于投资需求。此时，对于 B 而言，希望能够改善原有的居住条件，试图购买其中的 1 套房，但由于房价过高，受到预算约束，无法购买，这 1 套改善需求的住房呈现退出价格式过剩。对于家庭 A 购买和持有的这 4 套住房不是用于居住，是随着凯恩斯扩张政策到来的投资需求，一旦凯恩斯收缩政策时，将抛出这 4 套住房，于是市场增加的 4 套住房所带来的过剩就是饱和需求式过剩。

② 30%为购买住房的首付比例，也就是杠杆率。当房价下降至杠杆率及其以下时，住房的价值就与贷款价值等同，此时如果

全转移到金融机构，则市场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

此时，市场出现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房价出现“政策调控型价格粘性”。中央政府出于经济稳定的内在要求，为了防止系统性风险，具有进一步采用凯恩斯扩张政策的外部压力，使住房价格具有了“政策调控型价格粘性”，即中国住房价格没有像美国、日本那样完全依靠斯密自由市场方式大起大落，而是维持价格在稳定幅度下波动性上升。中国对住房价格的托底式调控成为了后发国家减少经济震荡的重要优势。另一方面，凯恩斯收缩政策将加剧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复杂性。假定由于“政策调控型价格粘性”，价格仅下降到 P_2 。在初期，市场需求曲线将首先回复到 D_2 ，使 Q_2Q_3 的虚假繁荣被挤出，市场回复到供需均衡状态。然而上述均衡状态很难实现，一旦价格开始下降，由于住房投资需求和住房供给调整速度具有不对称性，市场开始过度预期，并在羊群效应下快速下降，大量投资需求消失，市场需求曲线进一步回复到 D_1 ，市场需求急剧减少，现实的消费需求为 Q_5 。由于住房的耐久性，市场的供应量仍为 Q_3 。此时，相对于住房作为消费品时的市场均衡点 (P_1, Q_1) 而言， Q_5Q_1 是退出价格式过剩， Q_1Q_3 是饱和需求式过剩。相比较图 4（左）的过剩情况，图 4（右）中，凯恩斯收缩政策及中国特有的“政策调控型价格粘性”加剧了住房市场退出价格式过剩和饱和需求式过剩的复杂性。

住房市场的特殊性，表面上看是存在泡沫的问题（Han et al, 2016），背后却是住房的双重属性。住房投资需求干扰了住房消费需求，宏观政策又无法清晰的区分两类需求属性，使得现有住房市场主要为具有投资需求的群体进行供给，而无法正常为具有消费需求的群体进行供给。廖海勇、陈璋（2015）等研究显示，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住房市场中，投资属性要远远大于消费属性，因此，从供给侧来看，住房市场的核心应该从为投资者供给转向为消费者供给，从供给侧解决“为谁供给”的问题。

六、中国式产能过剩的解决：从凯恩斯主义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式产能过剩不是简单的周期性过剩，而是需求出现阶段性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这种阶段性结构变化也不是单一商品市场的变化，而是商品市场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叠加住房市场的需求属性结构变化的综合结果，具有典型的中国本土特色。面对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复杂成因，凯恩斯主义和其他西方宏观调控方式均无法切中要害，因而难以奏效，必然出现“三难”选择困境。亟需针对中国式产能过剩以二元市场饱和需求式过剩为主的新阶段特征，完成宏观调控体系的转向和重构，从凯恩斯主义转向“精准市场分类基础上适应二元市场需求结构”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 二元市场的“劣驱良”效应与凯恩斯主义的失灵

在二元市场中，凯恩斯主义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弱。这不是短期有效和长期无效的问题，而是二元市场的饱和需求过剩产生了“劣驱良”的效应，使得凯恩斯主义的运用条件与传导过程对当前二元市场的饱和需求式过剩失灵。

二元市场中的“劣驱良”效应是指二元市场饱和需求下，出于保值增值需求，商品市场的饱和需求源源不断转向住房市场的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形成劣势有效的“脱实向虚”趋势。在普通商品市场的饱和需求式过剩中，由于面临“饱和需求陷阱”，消费需求对已有国内供给商品的价格失去弹性，继续采用凯恩斯主义只会使资金投入形成需求外溢或转向虚拟投资，无法完成创新供给的任务。如图 2（右）所示，不断增加的阴影部分 P_1P_2IH 和 P_3P_1HG 将转向住房投资，等于图 4（左） ABQ_3Q_4 的阴影部分，形成明显的经济虚拟化和空转现象。2015 年货币供应增速超过融资和投资增速就是很好的佐证^①。2016 年 9 月末，广义货币（M2）

购房者选择不还贷款，风险就转移到金融机构中。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香港的房价按照市场规律狂跌至低于杠杆率，如果没有大陆的支持，金融机构的风险将十分巨大。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也是源于房价大跌后，购房者选择不还贷款的结果。

① 2015 年 12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39.23 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3.3%，狭义货币（M1）余额 40.10 万亿元，增长 15.2%，

余额 151.6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5%，同时全国多地住房价格出现疯长，也是对本文模型的有效印证。

只有有效解决普通商品市场的“饱和需求陷阱”和住房市场的“投资偏好陷阱”两大关键制约因素，使普通商品市场有利可图和住房商品市场无利可图时，转向住房投资属性的价值部分才能重新回流至普通商品市场，“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①的增长目标才能实现。

2. 中国式产能过剩的解决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两大关键方向

根据本文的拓展模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走向泛结构化。这一阶段，宏观调控体系转向的关键是解决两个陷阱，明确两大结构性调整方向。

第一，普通商品市场“卖什么”的供给方向问题。当前普通商品市场最大的制约是“饱和和需求陷阱”。解决需求对现有国内市场供给的弹性趋近于零的情况，就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中微观主体的需求发现功能，发现市场的潜在新需求。如果发现需求这一问题没有解决，就谈效率和质量的提升，仍然无法避免过剩问题。比如，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手机都是纯市场化企业而且效率和技术水平都很高，但是供给不适应和不满足潜在新需求，也会出现过剩，进而倒闭，因此，普通商品市场优先解决的，不应是怎么供给的效率提升问题，而是供给什么的需求发现问题。

第二，住房商品市场“卖给谁”的供给对象问题。当前住房市场最大的制约是“投资偏好陷阱”，不断推动消费需求转向投资需求。只有还原住房市场为消费需求服务的初衷，恢复其高风险高收益特性，重点抑制投资需求，才能保障市场的平稳可持续发展，而不是随着政策变化剧烈波动。当住房是基于正常消费下的稳定增长时，住房价格、土地财政、金融贷款等住房相关关系才能回复正常的发展。

(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导向

由单一市场分割式调控向二元市场联动式调控转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调控体系不区分市场边界，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机抉择下按照单一市场模糊调控，无法解决投资与消费的不完全替代性。本文的模型直指二元市场饱和需求下的中国式产能过剩及二元市场联动带来的“劣驱良”的效应。这是形成中国式产能过剩的最主要原因，也是干扰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矛盾，必须优先进行解决，才能推动下一个层级的各类改革。应重点监控二元市场中的资金流向，并对商品市场的消费结构和住房市场的需求属性进行精准区分。

商品市场由技术偏向式调控向需求认知式调控转变。以往主流观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然而已经跃升世界第二的 R&D 投入和世界第一的专利数并没有促进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本文的模型试图说明，面对普通商品市场中的“饱和和需求陷阱”，首先需要具备发现新需求的能力，优先解决生产什么，然后才是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的技术偏向式调控，解决怎么生产。不能简单仿效西方通过专利制度和产权制度提高效率的结果，而应强调发挥企业家等需求认知主体和互联网等新型需求认知工具的作用。

住房市场由价格导向型管理向属性导向型转变。将住房市场作为宏观调控体系转向和重构的起点，“去住房投资化”必须优先进行解决。以往住房市场的调控是立足于商品因素的价格调控。当住房市场价格过高时，政府甚至会干预住房的面积、户型、地段、房价、交房时间等商品因素，如我国曾实行 70、90 政策。现在有声音提出要房地产厂商降价，采取现售制度、不加区分的限购等都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当前住房市场应明确两个基本问题：一

流通中货币（M0）余额 6.32 万亿元，增长 4.9%。人民币贷款余额 93.95 万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 135.70 万亿元。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1.72 万亿元，比上年多增 1.81 万亿元，新增人民币存款 14.97 万亿元，比上年多增 1.94 万亿元。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5.41 万亿元，比 2014 年的 16.46 万亿元，少 1.05 万亿元。

① 2014 年 12 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商品市场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的发展阶段判断后，所提出的市场增长目标。

方面，必须发挥政府之手的作用，将与住房市场相关的土地和房地产管理纳入政府宏观调控体系，而不是市场化；另一方面，政府调控的方向应转向属性管理为主。属性管理的要义在于：住房属性的精准分类制度；住房属性变化的持续监测制度；盯住房屋数量为主的投资属性管理转为盯住交易转让环节和保有环节的投资属性管理，严格控制购买之后迅速转手买卖的时间、数量、成本、范围等投资属性。此外，出于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需要，以往复制西方经验得到的直接增税方法在中国现阶段不能快速推出，税收调控的时机选择更为关键，应在明确双重属性的量、范围、水平和科学评估金融系统风险后再慎重推出房产税。

七、结论

中国高速增长的 30 多年里，多数有意义的指导性理论均是党中央和政府从实践层面摸索和总结的有效战略方案，亟需采用符合中国实践的经济理论体系和现代经济学范式对这些方略进行原理性论证，而不是简单复制西方的技术关系和运行结果。本文是一次大胆尝试，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必由之路”这一核心命题，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这一轮中国式产能过剩的本质不能简单归结为制度性过剩，而是从传统的退出价格式过剩向商品和住房二元市场叠加的饱和需求式过剩转变。

第二，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是：普通商品市场消费结构升级后的消费饱和遭遇了住房需求属性结构变化后的属性饱和。其中由于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普通商品市场受到“饱和需求陷阱”的约束，资金转化为消费的过程受到阻碍，出现商品市场的饱和需求式过剩；受到阻碍的资金进入住房市场后，又面临住房市场饱和属性所带来的“投资偏好陷阱”，并随着凯恩斯调控政策的变化，形成住房市场的饱和需求式过剩，且进一步引发了二元市场中的“劣驱良”效应，使得凯恩斯主义失灵，经济“脱实向虚”。

第三，应从发展阶段转变背景下宏观调控体系转向和重构上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住房市场作为重构宏观调控体系的起点。现阶段单一调控商品市场的做法不起作用，亟需针对二元市场饱和需求式过剩这一新特征，完成宏观调控体系的转向和重构，从凯恩斯主义转向二元市场精准分类和联动调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不是从需求到供给的自然转向，而是这一阶段的必要解决方案。针对普通商品市场中的“饱和需求陷阱”，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之前，促使供给结构从技术偏向式转为认知偏向式，优先探索新需求是什么和在哪里，解决“供给什么”的问题。针对住房商品市场中的“投资偏好陷阱”，从价格导向型管理转向属性导向型管理，解决“为谁供给”的问题。与西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金融、外汇、贸易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不同。中国现阶段，住房市场在整个宏观调控中的意义与以往阶段相比更为突出。只有从宏观调控中“去房地产投资化”，才能使商品市场等实体经济的规律回复正常。

参考文献：

蔡昉，2013：《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经济研究》第 11 期。

蔡昉，2016：《认识中国经济减速的供给侧视角》，《经济学动态》第 4 期。

迟福林，2016：《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十三五”转型升级》，载于吴敬琏等著《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论文集），中信出版社，第 161—171 页。

胡鞍钢，周绍杰，任皓，201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清华大学学报》第 31 期。

黄益平，2016：《没有产业支撑的增长都是空谈》，载于吴敬琏等著《供给侧改革——经济转型重塑中国布局》（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26—31 页。

-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选题研究中心, 2016:《重点领域改革节点研判: 供给侧与需求侧》,《改革》第 1 期。
- 纪志宏, 2015:《我国产能过剩风险及治理》,《新金融评论》第 1 期。
- 贾康, 2016:《以制度供给为核心, 推进改革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 载于吴敬琏等著《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论文集), 中信出版社, 第 118—124 页。
- 贾康, 苏京春, 2015:《供给侧改革: 新供给经济简明读本》, 中信出版社。
- 李海明, 2014:《一个古典马克经济增长模型的中国经验》,《经济研究》第 11 期。
- 李兰, 2016:《影响中国企业创新的主要因素及政策建议》, 载于吴敬琏等著《供给侧改革——经济转型重塑中国布局》(论文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 第 266—276 页。
- 李扬, 2016:《供给侧改革该如何破题——权威专家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6 年年会上的发言摘登》,《中国经贸导刊》第 4 期。
- 李佐军, 2016a:《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载于吴敬琏等著《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论文集), 中信出版社, 第 65—69 页。
- 李佐军, 2016b:《制度变革令三大发动机释放新红利》, 载于吴敬琏等著《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论文集), 中信出版社, 第 90—107 页。
- 廖海勇, 陈璋, 2015:《房地产二元属性及财富效应的区域差异研究》,《财贸研究》第 1 期。
- 刘世锦, 2016:《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 载于吴敬琏等著《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论文集), 中信出版社, 第 111—117 页。
- 刘霞辉, 2013:《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国视角》,《经济学动态》第 10 期。
- 马斯洛, 2013:《动机与人格》,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祁晓冬, 1996:《从基数效用模型导出的个人需求函数》,《经济研究》第 12 期。
- 人民日报独家专访, 2016:《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 人民出版社。
- 卫兴华, 2016:《澄清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几个认识误区》,《人民日报》4 月 20 日。
- 吴敬琏, 2016:《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选择》, 载于吴敬琏等著《供给侧改革——经济转型重塑中国布局》(论文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 第 2—19 页。
- 习近平, 2016:《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5 月 10 日。
- 许宪春, 贾海, 李皎, 2015:《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 杨伟民, 2016:《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经济管理》第 1 期。
- 杨赞, 张欢, 赵丽, 2014:《中国住房的双重属性: 消费和投资的视角》,《经济研究》第 S1 期。
- 詹姆斯·M·亨德森, 理查德·E·匡特, 1988:《中级微观经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 Aghion, P. and O.J. Blanchard, 1994, “On the Speed of Transition In Central Europe”,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Vol.9, 283-320.
- Agnello, L., V. Castro, J.T. Jalles, and R.M. Sousa, 2015a, “Do Debt Crises Boost Financial Reforms”,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Vol. 22, 356-360.
- Agnello, L., V. Castro, J.T. Jalles, and M. Ricardo, 2015b, “What Determines the Likelihood of Structural Reform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37, 129-145.
- Antonio, S. and N.X.Y. Che, 2012, “Structural Reforms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IMF Working Paper*, WP/12/106, 1-33.
- Boeri, T., M.Castanheira, R.Faini, and V.Galasso, 2006, *Structural Reforms Without Prejudi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fendic, A., G.Pugh, and N.Adnett, 2011,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27, 586-599.

Han M.F., Q.L. Gu, W.Xiong, and L.A.Zhou, 2016,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Housing Boom",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Vol.30, 105-166.

Helbling, T., D. Hakura, and X.Debrun, 2004, *Fostering Structural Reforms in Industrial Countries*,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ollis B. C., 1960, "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0, 624-654.

John, W.,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Kevin G., M.A. McIntyre, and Hanlei Yun, 2016, "Structural Reform and Growth: What Really Matters", *IMF Working Paper*, WP/16/82, 1-30.

Why is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evitable?

-- Economic Explanation for Chinese Overcapacity

Zhou Mi and Liu Binglian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kai University)

Summary: China is the second biggest economy and one of the fastest-growing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is provides a vivid sample and huge experimental field for economic research.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China's economy has shifted from fast growth to moderate growth, and how to explain the reasons and mechanism behind the falling growth speed has become an issue of concern. China differs greatly from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slowdown. The stylized facts of slowdow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related with financial crisis and unemployment, and the structural reform is focused on fields including domestic finance development, trade liberalization, current account liberalization, labor market reform. In China, the lower pace of economic growth is characterized by overcapacity,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overstock and oversupply of products in 14 industries, particularly steel, cement and glass industries. In face of slower economic grow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proposed the policy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Why is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needed under the impact of Chinese overcapacity?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structural reform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oncerning on the topic, the paper tries to go beyo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in usual and provide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with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by analyzing the reflection, causes, nature and solutions of Chinese overcapacity. The paper provides the extended supply-demand model with two new assumptions, i.e. saturated demand and exit price, and proposes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consumption choice conditions, i.e. classic conditions in microeconomics, constraint conditions for the exit price and constraint conditions for saturated demand. It applies the extended supply-demand model to analyze the binary commodity market including both the common commodity market and the real estate market, and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We find that Chinese overcapacity is based on the saturated demand in the commodity and real estate markets. This is a new problem that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 offers no in-depth explanation but China needs to solve urgently. The paper concludes the reasons behind Chinese overcapacity as follows: As the commodity market is constrained by the "saturated demand trap", the shift from investment to consumption is hindered. When the funds transfer to real estate market, the hindered funds are stuck in the "investment preference trap" resulted from the saturated demand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That further leads to the effect of "the bad drives out the good" in the binary market and makes the practice of simply regulating the commodity market ineffective. So, regulating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s of greater significance in the whol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than ever before in China.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need to base on China's characteristics, conditions and practice. That is, regarding the "saturated demand trap" in the common commodity market, we shall identify what to supply based on the precise classification of market; regarding the "investment preference trap" i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we shall identify who will be supplied and carry out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with the focus on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supply directions and targets. In the future, three factors nee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making supply-side structure reform policy decision in China. The first, we shall transform from the segmented regulation for the single market to the interrelated regulation for the binary market. The second, commodity market shall shift from skill-biased regulation to cognition-biased regulation. The third, real estate market shall shift from price-based management to attribute-based management. What's more,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focuses on reforms in finance, trade, labor market and so on, China prioritizes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the binary market.

Key words: Chinese Overcapacit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Exit Price; Saturated demand

JEL: O11, E32, E10